

云岭阅读

用力书写独龙秘境 甜蜜事业和美好生活

——读马瑞翎《养蜜蜂的小都里》

凌之鹤

马瑞翎新著《养蜜蜂的小都里》(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2022年6月版)是一部清新欢快如山泉奔流,流动着民间气韵的儿童小说。该书通过对独龙族少年小都里暑假生活经历的生动讲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从多个角度巧妙地反映了独龙族在新时代的生活变迁和思想观念逐渐嬗变的历史进程,从一个侧面彰显了中国特色脱贫攻坚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喜人成就。

独龙族是云南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怒江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族这一响亮而豪气的族名,是周恩来总理根据该族聚居生活的独特地理环境和人民意趣取的。独龙族有语言无文字,历史上依靠刻木结绳记事、传递信息,日常生活(农耕时代)主要以刀耕火种和狩猎为主;当地民居多为木房或竹房,长期保持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传统美德;妇女曾以黥面为美,从前有文面之俗。

作为一个从原始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长年生活在高山峡谷中的独龙族人民,因为交通闭塞,像“一条扎紧了的口袋”,文化落后,受自然生存条件的限制,经济发展滞后,总体生活长期处于深度贫困之中。据相关新闻报道,2010年以来,云南省开始对独龙江乡独龙族启动“整乡推进、整族帮扶”项目和相关扶贫工程。2018年底,独龙江乡率先实现整族脱贫,独龙族实现了“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巨变。独龙江乡数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人民日新月异的生活气象,是一幅浓墨重彩、气势恢宏的壮丽画卷,深刻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独龙人民深切关怀。

怎样讲述独龙人生活千年大跨越这样一个近乎神话传说的伟大历史进程?一些作家以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文本拿出了优秀作品,曾长期从事小说创作且取得非凡成绩的马瑞翎,却以大篇幅“跨界”之势华丽转向儿童文学探索,近两年相继创作了广受好评的《独龙江上的小学》《木鼓敲响的日子》两部儿童文学力作,今年又推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养蜜蜂的小都里》。这部儿童小说关注的是独龙族人民稳健走向幸福美好新生活的日常景象,与讲述独龙族在实现整体脱贫之前“一师一校”即

将搬迁并校的姊妹篇——《独龙江上的小学》对照阅读,可以更进一步了解独龙族生活发展面临的艰难历程和辉煌成就。在少年的眼里,独龙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精神追求,在这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马瑞翎以轻快活泼的笔调,邀请读者跟随放置假的小都里,满怀好奇地走进他生活的村子里,并和他

一块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假期”。我们的小主人公才出场似乎就面临着尴尬的处境:作为学校监督员口中的“个别同学”,小都里的语文成绩才考了7分。承受着“学生不好好读书就是对不起国家”这一心理重负,可怜的小都里还是友好而真诚地给两个认为他有“交流障碍”的外来猎奇者当向导,耐心带他们去老村子里看“珍贵的老屋子”和仅存着的“文面人”。令小都里诧异的是,两个外来游客居然不喜欢村里那些现代玩意儿,却偏爱那种陈旧而光线黯淡的老宅,赞美被国家明令禁止的

文面陋俗——称赞“文面是一种美”。当“语文成绩很不理想”,考试“全校最低”这一令人害羞的事实,在家访后被摆在明处之时,小都里及其父母便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何解决“学好语文”和怎样“大规模养蜂”这两大具体问题。恰在此时,在村里助推扶贫的“工作队都里”——一个代表着“国家的态度”,肩负使命、希望“见证历史”,视“帮助一个民族前进”为英雄的汉族青年,表示要从小都里一家想“办法”解决问题。工作队都里离村上州市赴省城找“办法”之后,小都里经历了“退休巴丁变蝴蝶”(死亡),自己引养的“蜜蜂造反”离去,他爸爸为维护祖宗规矩与邻村的棚更棚打官司和进城卖蜂蜜被无良的贸易扒(做生意的男子)“棉马甲”欺骗等“重大事件”——不错,这些表面看似鸡零狗碎的日常琐事,对小都里来说却绝对是大事。因为这些小事件里蕴含着太多新鲜有趣又别具意义的原始信



息,它们在普通读者眼里,也应该算得上大事:退休巴丁之死,展现了独龙族固有的生死观和丧葬习俗(独龙族人相信人死后会变成蝴蝶,村里有人死了,村民要去帮忙,全村都得停止劳动三天,葬礼过后才能恢复正常);“蜜蜂造反”揭示了蜜蜂的生活习性和养蜂需要专业的知识;“在荒野全靠当众说理的所谓“打官司”,则呈

现了独龙族奉行祖制规矩的传统,体现了该民族对天赐之物的“共有共享”公心;小都里的爸爸被逼将野生蜂蜜廉价卖给制假售假的“棉马甲”,一方面曝光了独龙江之外的“不法奸商”欺行霸市的恶行,一方面则委婉地指出,一个人(民族)仅有善良和淳朴不足以活得更好,遑论发展壮大,而“落后无知”必然遭遇欺骗和霸凌。正如工作队都里所说:“看来光有新房子、新公路还不行,还得换个新脑子。”就连小都里都能感受到,“爸爸脑子里很多东西都又老又旧,不能再用下去了。”

工作队都里从省城回村之后,果然带来了解决棘手问题的“好办法”:一是拉回了很多真正的蜂箱,为全村实施规模化养蜂奠定了基础;二是送给小都里拼音和汉字卡并教给他强化学习的方法;三是让小都里的爸爸跟着小卖部的普松学做买卖(生意),并建议他学习酿酒的先进技术;四是通过播放独龙语老电影,引导“敢对不起国家”的文面老黛松顺利搬迁到新房子安居下来。这些别具意味的事情,在马瑞翎娓娓动听的讲述里,一桩一桩得到了圆满的落定。

小说结局以村里人为小都里共饮“开酒酒”,准备送他到乡里上学这一喜庆事件为隐晦,表达了独龙族人民坚定走向美好明天的激情、决心和信心——“快乐的音乐在脑子里响起,一个秘密通道就会在前边出现。通道的那一头就

是一个更新、更好的未来世界”。读罢小说,知道一批又一批的工作队都里将继续来到村里和乡亲们一起推动乡村振兴,因为大家心里都承认,“国家是幸福的源泉,是所有人的中心,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事物”,读者完全有理由相信,秘密通道的那边确实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掩卷之余,我们眼前好像浮现出一只只新生的“独龙蜂”,耳畔似乎也回响着群蜂飞舞的嗡嗡之声,想象着独龙族人民方兴未艾的甜蜜事业和来日可期的美好生活:一个全新的“独龙秘境”正向辽阔的世界敞开。

马瑞翎是一个酷爱心灵自由、头脑清醒又安静的独立写作者,她与喧嚣的时代和浮躁的文学圈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但这并不妨碍她以冷静平和的目光关注她所置身的这个世界。从《独龙江上的小学》《木鼓敲响的日子》到《养蜜蜂的小都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瑞翎的儿童文学有别于传统固化的写作思路和陈旧手法,其创作可谓别出心裁,独辟蹊径:她擅长从现实生活中取材,体贴人心,关切人性,直面对下,善于贴近自然和现场书写。在她的

儿童小说中,主人公已不仅仅局限于儿童,她更愿意将儿童置身于成人的世界,与同为主角的成人一起来讲述作为儿童自己的故事;她原创的故事独具自然而真实的原生态品质,既不刻意规避或美化生命和人性的复杂与痛感,亦不为迎合市场而猎奇媚俗——尤其是关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生活和其形象扮荒式的书写,她满怀热爱和真诚,以其情理性的眼光,激浊扬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遗余力彰显民间文化的圣洁至美;尤为可贵的是,她坦诚如赤子般自觉面对此时的“乡土”,并以现代文学的艺术手段全力挖掘当下基层的民族生活美学。总体而言,在我看来,马瑞翎以她简约清澈,寄托美好,充满阳光雨露而又别具意味的动人故事,已逐渐拓展出一个文学性与儿童性相得益彰,思想性和艺术性相互辉映的美学境界。我以为,马瑞翎以其个性鲜明、风格独特和辨识度极高的儿童小说,将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领域,至少在关于民族儿童文学题材的发掘和建构上,已独树一帜,自成风景。

新书快递

真实再现觉醒年代启蒙家形象

——读《笔醒山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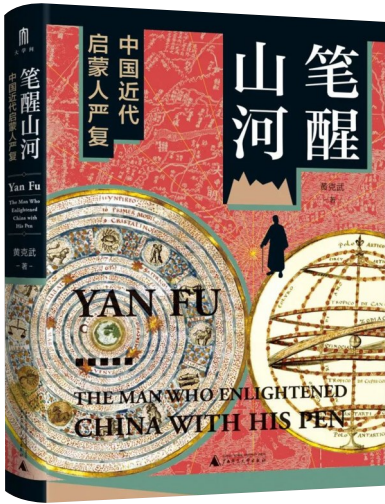
邓勤

严复为清末民初第一代接受新式教育而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家、思想家与教育家。他所介绍的西学,以及他对中西文化的思考,成为中国现代思想的重要源头。梁启超称赞严复“于中学西学皆为我中国第一流人物”。他的好友陈宝琛在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曾说:“君子学无所不窥,举不究极原理,亦不究极原委,扶其得失,证明而会通之。”文中的

“会通”二字,正是严复一生思想的核心,它本身即结合了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以及科学、宗教与伦理等。

台湾学者黄克武认为,在清末民初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过程之中,严复思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清末时,严复的作品一方面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孕育了批判传统、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也展开对胡适、陈独秀等这一启蒙论述的反思,探索科学、民主、爱国、反传统等观念的局限或缺失。黄克武最新出版的《笔醒山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1月版)包括“以翻译开启民智”等三部分,“严复论中西文化”等20多个专题,围绕着严复的历史处境与人际关系、严复的思想内涵两条轴线展开,是一部建立在扎实学术基础上的通俗化、大众化的严复传记。

作者多年来精研严氏生平思想,不遗余力。同时,走访了严复一生所去过的几个重要地方,如英国的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法国的凡尔赛宫和天文台等,史料翔实,厚积薄发,深得严学意指。作者从严复的记忆出发,生动再现了他与张謇、梁启超、孙中山等



多位启蒙先驱的际遇,从而还原了一幅觉醒年代的真实图景。在作者笔下,严复并非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而是一个时常踽踽独行的背影。作者试图从学术普及的角度,简明扼要地向读者描述严复走向世界所遇挑战、所经挫折与所得成就。

作者认为,严复结合中西的努力和他的成长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他幼年时代研读中国典籍,进入福

州船政学堂与赴英留学期间,开始接触西学。同时,却未抛下对中国传统古典价值的信念。返国后,严复师事吴汝纶,学习桐城古文,又研习八股制艺,继而系统地阅读西书,奠定中西学问的基础。他不但用这种态度培养他的子女,后来在主持几个教育机构时,更将中西合璧的构想付诸实际,来教育学生。他一生秉持的理念是“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

然而身处中西文化接轨之关键时刻,也让严复一生充满了冲突与挫折。作者认为,严复长期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冲撞、拉扯。他深深感受到悲伤与苦痛是人生所难以避免的经历,在遗憾之中他说:“做人分量,不易圆满。”人生的智慧不在于达到完美的境地,而是在体认人生的不圆满之中,超越现实的痛苦。

在清末民初这个大转型的时代,严复是一个既现代又传统的变革者。本书不仅是一把认识严复的钥匙,更是一个理解百年革命狂潮的切口,它以生动、精准的语言,细腻的手笔,书写了这位近代启蒙家诸多不为人知的内容,为读者还原了一个丰满的严复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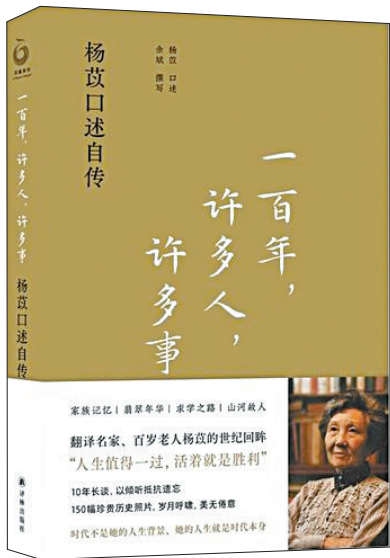
娜嫫娅珍

一个人的阅读史

张旗

新书架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出版



由杨苡口述、余斌撰写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日前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2023年1月第1版)。这是一部著名翻译家、作家杨苡女士唯一口述自传,记录了一位百龄老人的成长史和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也是一个个体见证下的百年中国史。

出生于1919年的杨苡(今年1月27日去世),主要译著有《呼啸山庄》《永远不落落的太阳》《俄罗斯诗歌》《伟大的时刻》等,还著有儿童诗《自己的事自己做》、通信集《雪泥集》(与巴金合著)等。由她翻译的《呼啸山庄》是最流行的中译本之一,她也是此中文书名的首译者。杨苡的人生经历了几个时代,也碰到了很多人,而其中就立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一段历史,尤为引人注目,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陈梦家、吴宓、巴金……这些在史书中记载的人物,其实都是她记忆里鲜活的存在和同行人。书中还收录了自20世纪初以来150张珍贵历史照片,辅以翔实图注作为口述的延伸和补充,十分难得。

郑千山

鱼水情深 可歌可泣

——少数民族电影《红麦》观后

和松阳

近日,红色文化主题电影《红麦》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深受观众好评。作为红军长征过丽江这段历史的研究者和长期关注红军长征影片多年的读者,我深受电影《红麦》的触动。

1936年4月25日至28日,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六军团18000多名将士在贺龙、任弼时、萧克、关向应、王震等率领下进入丽江,在玉龙各族人民的有力支持、帮助下,用4天3夜成功抢渡金沙江天险,甩开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北上四川甘孜境内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并与红四方面军一起在甘肃省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从而实现了长征史上主力红军部队三大会师的伟大胜利。红军经过丽江时留下了一段光辉的历史,也留下了一段军民鱼水情深的佳话,尤其是玉龙太安乡红麦村人民群众抢救红军伤员、掩埋经过螳螂坝时牺牲的红军战士、世代守护红军墓的感人故事可歌可泣,至今广为传颂。《红麦》以此为背景,以女红军伤员田双妹被纳西族小伙子木老三一家多次机智相救的感人故事,表现了丽江少数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善良淳朴为民族为人类解放事业奉献自己大仁大义的民族气节。

《红麦》的拍摄主场景取景于云南省丽江市境内的白沙镇、太安乡、九河乡、大具乡、石鼓镇等地,影片中呈现的美丽自然景观与云南少数民族群众朴实善良又深明大义朴素情感相得益彰。影片《红麦》以小见大,通过人物的故事展现了红军长征过丽江这段历史。影片里的一些经典台词也深深打动了观众朋友的心。

面对内忧外患的祖国,“我不管他什么共产党、国民党的,只要在当兵的后生牺牲了,就是村里的英雄,这裤子要飘6天6夜,还要请东巴做撒魂仪式,这是村里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规矩,这规矩不能破。”朴素的语言道出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群众的道义坚守、临难之地的纳西族人口不多,但历朝历代都保持着这样忠于国家大义的优良传统和民族气节。

《红麦》以艺术的视角全面展示了丽江红军兄弟民族团结、和睦、友善、纯朴的形象;真实还原了丽江民众迎接、认识、接受、拥护红军的过程;深刻阐述了重温、学习、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重大意义。《红麦》一改战争影片依托大事件、大人物、大场面表现主题的模式,以平凡人物、平凡场景、平凡故事来

反映颇具重大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红二、六军团抢渡金沙江之壮举,加之影片的服装、形象、语言与现实生活和民族习俗紧密联系、无缝衔接,更加增添了影片的生活性、大众性、现实性。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中国电影创作领域一朵独具魅力的艺术之花,在中国百年电影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一直以多样的艺术风格、多彩的民族特色、丰满的人物形象、优美的音乐舞蹈以及释放出来对自由生活、真挚爱情、英雄主义、团结友爱、家国情怀、崇高理想和时代正能量而深受观众的喜爱。新时期以来,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从民族电影主体逐渐趋于寻求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文化意向回归传统,思考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意识形态的冲突等,它从过去政治加风光的叙事方式,逐步过渡到了民族风情与原生态的展示及对民族精神的深度诠释,对中华民族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虔诚思考,以及对追求人类共同理想、诗意与尊严的执着追求。同时,也因为有不拘一格的叙事方式,出现了一大批丰富多彩并具有文化价值的本土少数民族各类型电影。每部优秀的电影背后必然需要“一剧之本”的电影文学剧本来作为支撑它的基础,这点笔者在2015年创作剧本《遗忘的时光》中深有感触。

《红麦》的编剧、导演张春和是多年来深深扎根于少数民族电影艺术土壤的纳西族导演。他1958年生于丽江石鼓,1987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美术系,系八一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壁画学会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还是当代东巴画派具有代表性的创始人之一,一直致力于研究当代东巴绘画。从1987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开始,先后在德国、瑞士、法国、新加坡、北京国际艺苑、红门画廊、可创艺苑等举办10多次个人画展,有100多幅油画和重彩画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国际艺苑美术馆、瑞士苏黎世大学博物馆、美国阿拉巴马大学艺术馆及多人收藏。其壁画作品《东巴神韵》获“首届中国壁画大展”佳作奖,担任美术总指导的《集结号》获第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9项提名奖。担任导演的《云上石头城》获第26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少数民族电影优秀新片奖等奖项。出版《张春和

当代东巴绘画》《张春和画集》《中国美术家档案·张春和卷》等专著。

张春和从18岁当兵开始就与电影结缘,刚进军营,这个热情英俊的纳西族小伙子就当上了电影放映员,1987年调进八一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美术师,一干就是30年,临近退休时又做起了编剧和导演。不移其志地想为本民族拍摄几部电影的梦想从离开家乡从事电影事业的第一天起就已经扎根在心中。也正因为怀有这长它的情怀,他后来的所有精力和感情都已投入到了本民族的影视创作的艰辛的苦苦事上。目前已完成了《云上石头城》《纳西鹰猎人》《云从雪山飘来》《兴盛番族》《云天外》《森格格姆》《忠义坊》《红麦》《白沙丽人》《愿》《革囊渡》《东巴、东巴》《承诺》十几部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其中《云上石头城》《愿》《红麦》已拍摄成片。

在张春和看来,一个成功的剧本,它的故事内核尤为重要。影片应有颇具特色的开始、高潮、结尾、巧合、冲突才能使之构成妙不可言的戏剧性。特别是重要因素的强弱,对影片外在类型的成败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每一个人都生活于命运的诸多可能性之中,创作者用自己的灵感和悟性虚构故事,从而完成对于现实情景升华性的审视。关注人物命运,探索人物的生命体验,发现每一个人物

的相同与独特性。进一步发现生活的隐秘性和不同人物身上的隐秘性,正是影视剧作的永久魅力。

电影《红麦》源于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又超越了故事本身,通过少数民族群众在面对红军战士危急关头所表现出的种种情感和正义之举,体现了作品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精神境界,也体现出在困难面前深明大义,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和对逝者生命的尊重与关爱,通过影片表现的故事,可见作者建立在丰富生活底蕴基础之上的想象力、创造力,也体现了作者深深扎根少数民族群众当中的文化体验和情感认同。

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云南日报文艺教科中心
合办
邮箱:wyxgimzg@163.com